

在准新婚个体中验证未来取向应对的序列模型

苗淼^{1,2}, 王雅琦², 叶青², 可钦², 甘怡群²

(1. 中国政法大学社会学院, 北京 100088; 2. 北京大学心理与认知

科学学院及行为与心理健康北京市重点实验室, 北京 100871)

【摘要】 目的:未来取向应对包含预先应对和预防应对,但二者之间的关系存在争议。本研究将在准新婚群体中,通过纵向设计来验证未来取向应对的序列模型,揭示预先应对与预防应对之间的序列关系。**方法:**采用方便取样,在120位一年内准备结婚的准新婚个体中,在间隔两个月的两个时间点上进行问卷调查,测量个体对于结婚的认知评估、未来取向应对,以及幸福感和压力知觉。**结果:**预先应对和预防应对均与幸福感显著正相关,与压力知觉显著负相关。模型比较和中介分析的结果验证了未来取向应对的序列模型。**结论:**本研究进一步澄清了预先应对和预防应对之间的关系,表明预防应对和预先应对是相互衔接、相互补充的序列阶段。

【关键词】 未来取向应对; 预防应对; 预先应对; 序列模型; 准新婚个体

中图分类号: R395.6

DOI: 10.16128/j.cnki.1005-3611.2017.04.020

Verification of the Sequential Model of Future-oriented Coping in Engaged Individuals

MIAO Miao^{1,2}, WANG Ya-qi², YE Qing², KE Qin², GAN Yi-qun²

¹School of Sociology, China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Beijing 100088, China; ²School of Psychological and Cognitive Sciences and Beijing Key Laboratory of Behavior and Mental Health,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Future-oriented coping consists of preventive coping and proactive coping, bu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se two remains controversial. The present study aimed to test the sequential model with longitudinal data in individuals facing marriage and explore the sequential relationship between proactive coping and preventive coping. **Methods:** Convenience sampling was conducted and data were collected from 120 individuals who planned to marry within a year. Self-report questionnaires were administered at two time-points with two months apart, measuring individuals' cognitive appraisal, future-oriented coping, well-being, and perceived pressure. **Result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both preventive and proactive coping were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well-being and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perceived pressure. Moreover,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and mediation analyses confirmed the validity of the sequential model. **Conclusion:** The present results help to further clarify the connection and difference between preventive and proactive coping, demonstrating that they are sequential stages that are connected and complement each other.

【Key words】 Future-oriented coping; Preventive coping; Proactive coping; Sequential model; Engaged individuals

结婚对大多数人而言,是人生中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如何应对新婚生活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议题。同时,结婚带来的心理压力和负担也不容小觑。因此,对准新婚个体来说,结婚不仅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在一定程度上也可能被视作一种威胁。本研究将以一年内准备结婚的准新婚个体为研究对象,探讨未来取向应对的潜在作用,并考察预防应对与预先应对的联系和区别,验证未来取向应对的双阶段序列模型。

传统的应对聚焦于已经发生或正在发生的压力事件,遵循被动的“刺激-反应”模式,因此被称为反应性应对^[1]。而实际生活中的压力源,不仅存在于当下或过去,也可能存在于未来。基于此,Aspinwall和Taylor提出了“预先应对”,即在潜在的压力性事

件发生之前,提前采取措施来阻止压力事件的发生或者改变其发生的形式^[2]。

之后,Schwarzer和Taubert重新对“预先应对”进行界定,并与“预防应对”进行区分^[1]。两者均聚焦于未来的压力事件,有一些相同的外在表现,例如积累资源、长期规划、提升技能。但是,两者对于压力源的评估不同:预防应对(preventive coping)主要针对长远而不确定的威胁性压力源(例如失业或被迫退休),个体为了尽可能减小该压力源带来的损失而提前进行资源的积累;预先应对(proactive coping)则聚焦于挑战性压力源,其目的在于促进自我提升和成长。因而,预防应对被视作威胁管理,预先应对被视作目标管理^[1,3]。

为了突出与传统应对的不同,甘怡群等人将预防应对与预先应对合称为未来取向应对,它被视为一种更积极、更具目的性的应对方式,代表了积极心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项目批准号:31571154)

通讯作者:甘怡群,ygan@pku.edu.cn

理学的影响^[4,5]。Aspinwall指出,在毕生发展的背景下研究未来取向的思维和行为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尤其当个体面对诸如老年化、退休和健康问题时,未来取向应对在日常生活中发挥了关键的作用^[6]。近年来,已有不少研究证实了未来取向应对的积极作用。例如,对于大学生,未来取向应对有助于提高学业投入、降低学业倦怠^[4,7]。在应届生求职过程中,未来取向应对能够降低压力水平,预测较好的求职结果^[8]。同时,未来取向应对水平较高的个体,其幸福感和生活满意度更高^[9],更愿意改变健康行为^[10],也更愿意从压力事件中寻求积极意义,促进自身成长^[9]。

预先应对的五阶段模型指出,预先应对主要包含五个阶段:资源积累、注意辨识、初级评估、初步应对和反馈生成^[2]。由于Aspinwall和Taylor并没有区分预先应对和预防应对,并且他们对预先应对的界定与Schwarzer和Taubert有所不同,因此,五阶段模型无法对未来取向应对的两种方式进行对比和区分。

在Schwarzer和Taubert的理论中,由于预防应对源于对压力事件的威胁评估,预先应对源于挑战评估,两种应对形式被视作相互独立的关系,平行存在。甘怡群等人基于五阶段模型,同时结合Schwarzer和Taubert的相关理论,提出了平行模型和序列模型两种假设^[5,6,8,11]。平行模型遵循Schwarzer和Taubert的观点,预防应对与预先应对独立存在,以平行关系中介初级评估对于应对结果的影响。序列模型则进一步强调两者的内在序列关系:在应对未来应激事件的早期阶段,由于压力事件相对较为遥远,且不确定性较高,个体倾向于采取防御性的应对方式——预防应对,即提前进行资源的积累。随着时间的临近,未来压力事件变得更为明确,此时,个体将采取更为主动、更具目的性的应对方式——预先应对。因此,序列模型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与五阶段模型相呼应:早期进行的预防应对与第一阶段类似(积累资源),后续进行的预先应对则与第四阶段类似(初步应对)^[7,8,11]。大学生和高中生群体中的研究均表明,序列模型的拟合优于平行模型,从而揭示了未来取向应对的双阶段序列模型^[8,11]。

近年来,聚焦于新婚夫妻的研究越来越多,而研究者者们较多关注个体的特质变量(例如夫妻相似性和情绪调节能力^[12-14])和夫妻互动(包括夫妻间的沟通行为、婚姻暴力和冲突管理^[15,16])对于新婚生活的影响。而准新婚个体同样处于人生的转折点,在面

临即将开始新婚生活这一未来应激源时,他们大多承担着较大的经济和心理压力,却鲜有研究关注该群体在这一阶段中的应对过程,尤其是从未来取向的视角来进行探讨。本研究将聚焦于这一群体的未来取向应对,并选取两个常用的指标来衡量他们的应对结果:生活幸福感^[17]和知觉到的压力^[18]。

本研究的第一个目的是在准新婚群体中验证未来取向应对的积极作用。我们假设,预防应对和预先应对均与生活幸福感呈正相关(假设1),与知觉到的压力呈负相关(假设2)。本研究的第二个目的是验证未来取向应对的双阶段序列模型。依据应对过程理论(coping-as-process theory),个体首先进行认知评价,进而引发应对行为^[19]。因此,我们假设准新婚个体首先针对结婚这一应激源进行初步评估,继而展开应对。基于甘怡群等人的研究结果,我们假设,在应对阶段,个体首先采取预防应对,继而采取预先应对(假设3)。为了弥补前人研究在横向上设计上的不足^[8,11],本研究将采用纵向设计来增强序列模型的说服力。

1 方 法

1.1 研究对象

选取计划在一年内结婚的准新婚个体参与研究,均为初婚。分两个时间点进行问卷调查,间隔两个月。时间点一招募到127位被试,有效数据126份。其中122人参与了时间点二的追踪调查。在所有被试中有2对是配对情侣,其余均只有情侣一方参与。由于违反独立性假设,随机删除配对情侣中的一方,共删除两人。最终,时间点一有124份有效数据,时间点二有120份有效数据。最终样本量的大小能够满足采用偏差校正的自抽样(bootstrap)进行中介分析的数据要求^[20],同时也达到了结构方程模型分析的最小标准^[21]。时间点二的样本包含69位女性(57.5%)和51位男性(42.5%);平均年龄为 28.34 ± 3.19 岁,最小23岁,最大36岁。时间点一距离被试的预期结婚日期为 7.29 ± 2.77 个月。被试来自不同的行业,主要是信息技术(12.5%)、金融(11.7%)、广告(10%)、医药(10%)和通信行业(8.3%)。

1.2 研究工具

1.2.1 未来取向应对 使用Gan等人修订的未来取向应对量表^[4],测量个体对于潜在应激源的应对行为和态度。该量表包含预先应对和预防应对两个维度,在原版本的基础上,删除因素分析中载荷不高的

条目后,两个分量表各包含4个条目。使用6点计分,从1(完全不符合)到6(完全符合)。在本研究中,预防应对和预先应对的 α 系数分别为0.83和0.81。

1.2.2 知觉到的压力 采用压力知觉量表(Perceived Stress Scale, PSS)测量个体知觉到的压力水平^[18,22],共14个条目。使用5点评分,从1(从来没有)到5(很多)。在本研究中的 α 系数为0.91。

1.2.3 生活幸福感 采用幸福指数量表来测量幸福感水平^[23,24]。该量表由两部分组成:总体情感指数量表及生活满意度问卷,前者包括8个条目,从不同角度描述个体的情感状态;后者只有1个条目。将总体情感指数量表的平均分与生活满意度条目的得分(权重为1.1)相加,即为幸福感总分。使用7点评分,总量表的 α 系数为0.96。

1.2.4 挑战评估和威胁评估 为了测量被试对于结婚这一应激源的认知评估,参考Hu和Gan的做法,基于应对的认知评价框架^[25]编制相应条目。威胁评估的三个条目是“对于我个人而言,结婚是难于应付的/让我惧怕的事情/一种更重的担子”;挑战评估的三个条目为“对于我个人而言,结婚是有助于自我成长的/一个新的机遇/我期待已久的”。采用5点评分,从1分(完全不同意)到5分(完全同意)。威胁评估和挑战评估量表 α 系数分别为0.61和0.75。

1.3 施测方法与数据处理

通过北京大学心理学系的在职研究生,结合方便取样和滚雪球抽样招募被试。所有被试均自愿参

与研究,在签署知情同意书之后,匿名完成问卷。时间点一调查人口统计学信息,并发放挑战评估和威胁评估量表。时间点二发放压力知觉量表和幸福指数量表。为了验证未来取向应对的双阶段序列过程,预防应对分量表在时间点一进行施测,而预先应对分量表在时间点二进行施测。采用SPSS 18.0和Lisrel 8.80进行数据分析和处理。对于结构方程模型,基于Hu和Bentles给出的模型拟合标准,RMSEA应小于0.08,CFI应大于0.95^[26]。

2 结 果

2.1 流失分析

时间点一有124个样本,时间点二有120个样本,流失率为3.23%。流失分析显示,流失的被试与未流失的被试在人口学变量(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和收入水平)和研究变量(挑战评估、威胁评估、未来取向应对)上均没有显著差异。

2.2 描述性统计

表1给出了所有研究变量的平均值、标准差以及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配对样本 t 检验表明,被试对于结婚这一应激源的挑战评估高于威胁评估($t=12.02, P<0.001$)。

相关分析显示,预先应对、预防应对与压力知觉和幸福感呈现相似的相关模式:二者均与知觉到的压力负相关($P_s<0.01$),与幸福感指数正相关($P_s<0.01$)。此外,两种应对策略均与挑战评估显著正相关($P_s<0.05$),与威胁评估显著负相关($P_s<0.01$)。

表1 研究变量的平均数,标准差,相关系数及内部一致性系数(N=120)

变量	M	SD	1	2	3	4	5	6
1.挑战评估_t1	4.06	0.65	(0.75)					
2.威胁评估_t1	2.50	0.91	-0.62**	(0.61)				
3.预防应对_t1	4.61	0.61	0.19*	-0.26**	(0.83)			
4.预先应对_t2	4.35	0.72	0.31**	-0.35**	0.64**	(0.81)		
5.压力知觉_t2	2.79	0.48	-0.20*	0.32**	-0.57**	-0.71**	(0.91)	
6.幸福感_t2	10.40	1.84	0.50**	-0.35**	0.26**	0.43**	-0.35**	(0.96)

注: 对角线上粗体数值为量表的 α 系数; * $P<0.05$, ** $P<0.01$ 。

2.3 结构方程模型(SEM)

首先,以知觉到的压力为因变量,考察认知评估经由未来取向应对对压力水平的影响。基于假设3,建立两个竞争的结构方程模型进行模型比较,表2给出了模型的拟合指数。在初级评估到压力知觉之间,在序列模型中,预防应对和预先应对以序列顺序存在(图1和图2);而在平行模型中,两者以平行关系存在。结果显示,在挑战评估和威胁评估的模

型中,序列模型的拟合均优于平行模型。即,挑战评估和威胁评估均通过引发“先预防应对后预先应对”的序列应对行为,缓解个体的压力水平。

继而,以幸福感指数为因变量,考察认知评估经由未来取向应对对幸福感水平的影响。由表2可知,与压力知觉模型的结果一致,在挑战评估和威胁评估的模型中,序列模型(图3和图4)的拟合均优于平行模型。即,挑战评估和威胁评估均通过引发“先

预防应对后预先应对”的序列应对行为,提升个体的 幸福感水平。

表2 序列模型和平行模型的拟合指数(N=120)

模型类别	自变量 (评估类型)	因变量	χ^2	df	χ^2/df	P	RMSEA	CFI	GFI	NNFI
平行	挑战	压力	131.93	61	2.16	<0.0001	0.099	0.94	0.85	0.92
序列	挑战	压力	95.35	61	1.56	0.0032	0.069	0.97	0.89	0.96
平行	威胁	压力	127.38	61	2.09	<0.0001	0.096	0.95	0.86	0.94
序列	威胁	压力	108.29	61	1.78	0.0002	0.081	0.96	0.88	0.95
平行	挑战	幸福感	151.56	61	2.48	<0.0001	0.112	0.91	0.84	0.89
序列	挑战	幸福感	109.85	61	1.80	0.0001	0.082	0.95	0.88	0.94
平行	威胁	幸福感	132.34	61	2.17	<0.0001	0.099	0.94	0.85	0.92
序列	威胁	幸福感	114.43	61	1.88	<0.0001	0.086	0.95	0.87	0.9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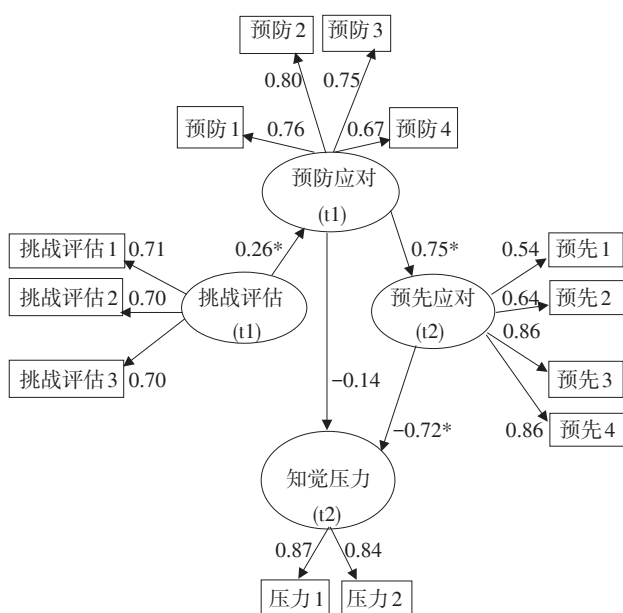


图1 未来取向应对的序列模型(从挑战评估到知觉到的压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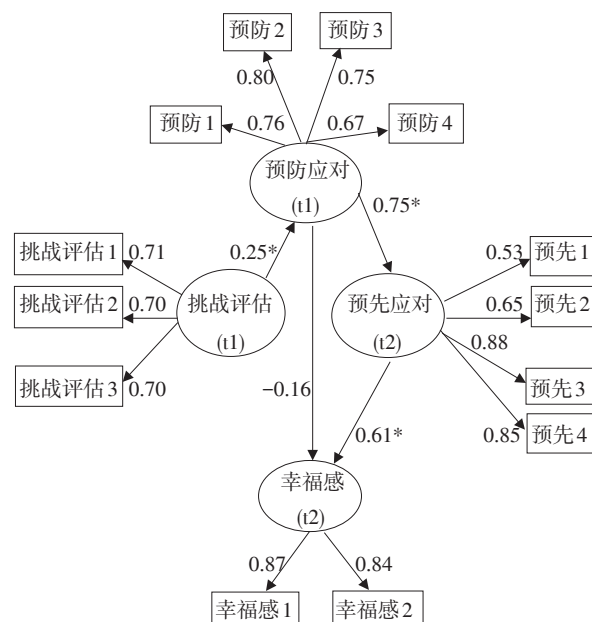


图3 未来取向应对的序列模型(从挑战评估到幸福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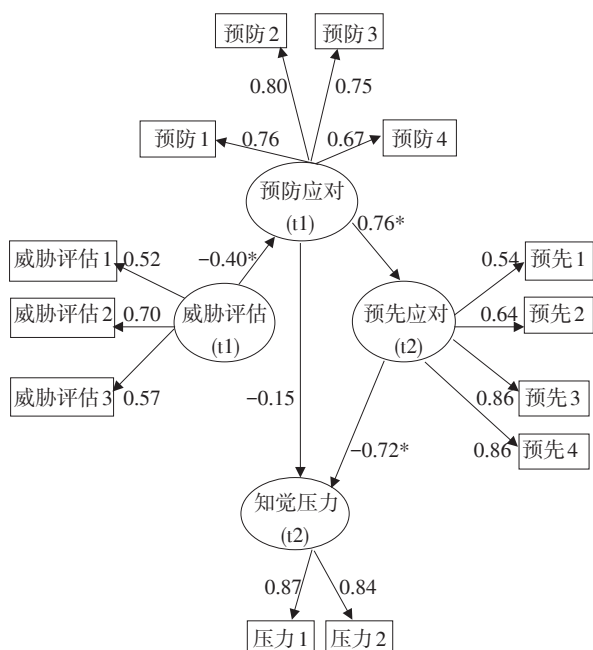


图2 未来取向应对的序列模型(从威胁评估到知觉到的压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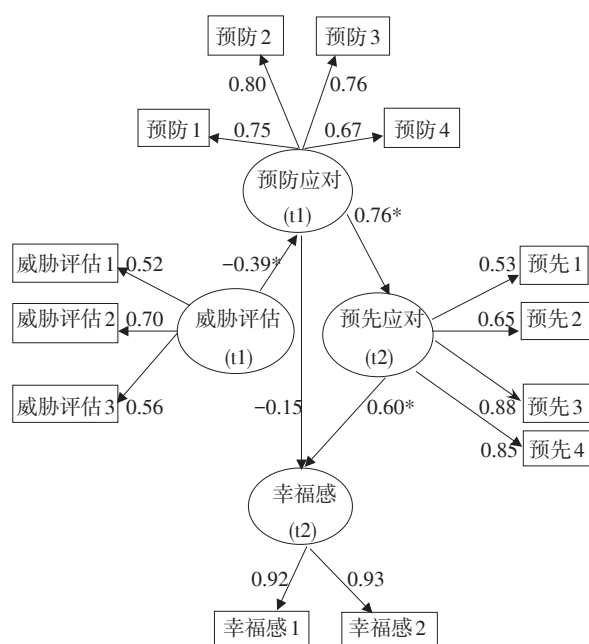


图4 未来取向应对的序列模型(从威胁评估到幸福感)

2.4 中介分析

鉴于SEM证实了预防应对与预先应对的序列关系,使用自抽样程序和相应的SPSS宏^[27]进一步验证“认知评估t1→预防应对t1→预先应对t2”这一中介作用。控制年龄和性别,将自抽样样本数设为5000。结果表明,对于挑战评估, $\beta=0.17$, $SE=0.08$,95% $CI=[0.0087, 0.3246]$ 。对于威胁评估, $\beta=-0.16$, $SE=0.06$,95% $CI=[-0.2825, -0.0421]$ 。这就再次验证了“先预防应对后预先应对”的序列关系。

3 讨 论

3.1 未来取向应对的积极作用

由于应对研究有相当大的情境驱动性,在提及未来取向应对的积极作用时,应结合不同的研究情境进行阐述。本研究在准新婚群体中发现,预防应对、预先应对均与幸福感正相关,与知觉到的压力负相关,假设1和假设2都得以验证。这与已有的研究结果一致,即未来取向应对能够促进积极结果、缓解消极结果。未来可以考虑通过实验研究或者干预研究,更好地说明未来取向应对的积极作用。

根据Schwarzer和Taubert的观点,预防应对源于威胁评估,预先应对源于挑战评估^[1]。相关分析显示,与过去的研究结果一致^[8],预防应对和预先应对均与挑战评估正相关。同时,我们还发现,预防应对和预先应对均与威胁评估负相关。这就需要结合应激情境,重新探讨认知评估和未来取向应对的关系。本研究中,挑战评估显著高于威胁评估,因此结婚更多被知觉为挑战性情境,而非威胁性情境。我们推测,在挑战性的应激情境中,从情境-评估匹配性的角度考虑,挑战评估有利于激发应对动机,促进未来取向应对;而威胁评估可能会抑制应对动机,导致威胁评估越高的个体,预防应对和预先应对反而越少。未来需要进一步在威胁性应激情境中,从情境-评估匹配性的角度,考察威胁/挑战评估和预防/预先应对的关系。同时,通过对应应动机加以测量,更好地解释认知评估对于未来取向应对的影响。此外,基于延伸平行过程模型^[28],对于挑战性情境的评估包含威胁评估、挑战评估和应对效能,未来的研究可以探讨应对效能是否影响挑战/威胁评估与预先/预防应对之间的关系。

3.2 未来取向应对的双阶段序列模型

预防应对和预先应对的关系一直存在争议^[5]。本研究比较了平行模型和序列模型的拟合度,与过

去的研究结果一致^[6,8,11],在不同评估类型和不同结果变量的模型中,序列模型的拟合均优于平行模型。此外,预防应对到结果变量之间的路径均不显著,这就表明,预先应对(而非预防应对)对应应结果有更为直接的作用,进一步支持了“预防应对→预先应对”的序列关系,假设3得到证实,这就表明预防应对和预先应对不是完全独立的过程,而是在未来取向应对过程中相辅相成、互相促进的。

序列模型有助于解释未来取向应对的整个过程以及预防应对和预先应对在此过程中的不同作用。在面临未来应激源的初期,个体对压力源进行初级评估,发现潜在的危害和挑战^[2]。此时压力事件较为遥远,个体采取预防应对以确保安全、避免可能的损失和伤害。随着时间的推移,压力源逐渐明确,这时再进行预先应对,采取计划性和目标管理的策略,在寻求挑战的过程中促进自我成长。序列模型很好地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先稳定后发展”的知行风格,即在确保稳定的基础上,再谋求发展和自我成长。本研究中,准新婚个体将开始新婚生活知觉为更具挑战性、有利于自我成长的情境,类似于Hu和Gan所研究的应届生求职的情境^[8]。因此,在这种以自我提升为终极目标、同时存在威胁的情境中,个体倾向于首先采取预防应对来减小威胁,进而通过预先应对来促进自我成长与提高。

本研究将未来取向应对延伸到准新婚群体中,验证了未来取向应对的积极作用及双阶段序列模型。尽管序列模型在大学生样本中已有横向数据的支持^[8,11],本研究则在此基础上,在不同的压力情境中,利用纵向数据加以验证。Bode等人基于五阶段模型,开发了针对预先应对能力的干预项目^[29]。未来取向应对的双阶段序列模型则提供了新的干预思路:在针对未来的压力源提前进行应对的过程中,由于不同的阶段对应不同的目标,这就需要结合个体所处的阶段及这一阶段的目标进行有针对性的干预。

3.3 局限和展望

本研究存在一些局限之处。首先,在未来取向应对的测量上,本研究采用的未来取向应对量表^[4]聚焦于个体一般性的未来取向应对风格,未来的研究可以尝试根据具体的研究情境编制相应的行为量表,从而更好的揭示预防应对与预先应对深层的心理功能。其次,本研究实质上是两个时间点的半纵向设计^[30,31],未来的研究可以考虑在3个时间点上对所有变量进行测量,通过完整的纵向中介分析^[32]和

交叉滞后分析^[33]充分说明预防应对和预先应对之间的序列关系。最后,本研究的研究对象均是准新婚夫妻中的一方,未来的研究可以考虑收集成对的夫妻数据,通过多层线性模型的处理,将夫妻间的互动考虑在内,从而在个体内和个体间更全面地考察未来取向应对的序列过程及其积极作用。

参 考 文 献

- Schwarzer R, Taubert S. Tenacious goal pursuits and striving toward personal growth: Proactive coping. In *Beyond Coping: Meeting goals, Visions and Challenges*, 2002. 19-35
- Aspinwall LG, Taylor SE. A stitch in time: self-regulation and proactive coping.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997, 121(3): 417-436
- Sohl SJ, Moyer A. Refining the conceptualization of a future-oriented self-regulatory behavior: Proactive coping. *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2009, 47(2): 139-144
- Gan Y, Yang M, Zhou Y, et al. The two-factor structure of future-oriented coping and its mediating role in student engagement. *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2007, 43(4): 851-863
- 甘怡群. 未来取向应对的双阶段序列模型及其时间透视机制. *心理科学进展*, 2011, 19(11): 1583-1587
- 文敏, 甘怡群, 蒋海飞, 等. 成就动机与学业倦怠、学业投入: 未来取向应对的纵向中介作用. *北京大学学报: 自然科学版*, 2014, 50(2): 388-396
- Aspinwall LG. The psychology of future-oriented thinking: From achievement to proactive coping, adaptation, and aging. *Motivation and Emotion*, 2005, 29(4): 203-235
- Hu Y, Gan Y. Future-oriented coping and job hunting among college students. *The Psychological Record*, 2011, 61(2): 253-268
- Greenglass E, Fiksenbaum L. Proactive coping, positive affect, and well-being. *European Psychologist*, 2009, 14(1): 29-39
- Thoolen B, de Ridder D, Bensing J, et al. Beyond good intentions: The role of proactive coping in achieving sustained behavioral change in the context of diabetes management. *Psychology & Health*, 2009, 24(3): 237-254
- Gan Y, Zheng W, Wen Y. The sequential model of future-oriented coping and adjustment to university life: The role of attitudes as further evidence. *Psychological Record*, 2014, 64(1): 13-20
- Luo S, Klohn EC. Assortative mating and marital quality in engaged individuals: a couple-centered approach.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2005, 88(2): 304-326
- Woszidlo A, Segrin C. Negative affectivity and educational attainment as predictors of engaged individuals' problem solving communication and marital quality. *The Journal of Psychology*, 2013, 147(1): 49-73
- 张耀方, 方晓义. 城市新婚夫妻求助表达、伴侣支持应对和婚姻满意度的关系.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2011, 19(4): 496-498
- Williamson HC, Ju X, Bradbury TN, et al. Communication behavior and relationship among American and Chinese newlywed couples. *Journal of Family Psychology*, 2012, 26(3): 308-315
- 李晓敏, 方晓义, 琚晓燕, 等. 新婚夫妻冲突解决与日常沟通对婚姻质量的影响.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2016, 24(1): 13-17
- Neff LA, Geers AL. Optimistic expectations in early marriage: A resource or vulnerability for adaptive relationship functioning?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2013, 105(1): 38-60
- 刘婉婷, 蚁金瑶, 钟明天, 朱熊兆. 压力知觉量表在不同性别大学生中的测量等值性.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2015, 23(5): 944-946
- Lazarus RS. Coping theory and research: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Fifty Years of the Research and Theory of RS Lazarus: An Analysis of Historical and Perennial Issues*, 1993. 366-388
- Fritz MS, MacKinnon DP. Required sample size to detect the mediated effect. *Psychological Science*, 2007, 18(3): 233-239
- Boomsma A. Nonconvergence, improper solutions, and starting values in LISREL maximum likelihood estimation. *Psychometrika*, 1982, 50(2): 229-242
- Cohen S, Kamarck T, Mermelstein R. A global measure of perceived stress. *Journal of Health and Social Behavior*, 1983, 24(4): 385-396
- Campbell A, Converse PE, Rodgers WL. *The quality of American life: Perceptions, evaluations, and satisfactions* (Vol. 3508). New York: Russell Sage, 1976
- 汪向东, 王希林, 马弘. *心理卫生评定量表手册*. 增订版. 北京: 中国心理卫生杂志社, 1999. 318-320
- Lazarus RS, Folkman S. *Stress, Appraisal, and Coping*. Springer Publishing Company, 1984
- Hu LT, Bentler PM. Cutoff criteria for fit indexes in covariance structure analysis: Conventional criteria versus new alternatives.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A Multidisciplinary Journal*, 1999, 6(1): 1-55
- Preacher KJ, Hayes AF. Asymptotic and resampling strategies for assessing and comparing indirect effects in multiple mediator models. *Behavior Research Methods*, 2008, 40(3): 879-891
- Witte K. Putting the fear back into fear appeals: The extended parallel process model. *Communications Monographs*, 1992, 59(4): 329-349

- hypothesis.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985, 98(2): 310-357
- 13 Li XB, Wang ZM, Hou YZ, et al. Effects of childhood trauma on personality in a sample of Chinese adolescents. *Child Abuse & Neglect*, 2014, 38(4): 788-796
 - 14 Elzy MB. Examin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ldhood sexual abuse and borderline personality disorder: does social support matter?. *Journal of Child Sexual Abuse*, 2011, 20(3): 284-304
 - 15 葛纓, 李玉杰, 曹成刚. 中国新生代农民工人格特征与人际信任: 社会支持的中介效应(英文).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2016, 24(5): 881-889
 - 16 Moraru E. Childhood abuse experience. the effects on a child's personality and the role of the social support. *Social Work Review*, 2012, 4: 35-49
 - 17 Auslander W, Sterzing P, Threlfall J, et al. Childhood abuse and aggression in adolescent girls involved in child welfare: the role of depression and posttraumatic stress. *Journal of Child & Adolescent Trauma*, 2016, 9: 1-10
 - 18 Smith CA, Ireland TO, Thornberry TP, et al. Childhood maltreatment and antisocial behavior: comparison of self-reported and substantiated maltreatment. *American Journal of Orthopsychiatry*, 2008, 78(2): 173-86
 - 19 伍妍, 邓云龙, 潘辰. 儿童心理虐待与情绪行为问题: 社会支持的中介效应.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2011, 19(4): 494-495
 - 20 Scarpa A, Haden SC. Community violence victimization and aggressive behavior: the moderating effects of coping and social support. *Aggressive Behavior*, 2006, 32(5): 502-515
 - 21 史方方. 初中留守儿童问题行为及其与人格特征、社会支持关系的研究. 硕士学位论文. 湖南师范大学, 2012
 - 22 Xie X, Chen W, Lei L, et al.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ersonality types and prosocial behavior and aggression in Chinese adolescents. *Personality & Individual Differences*, 2016, 95: 56-61
 - 23 Brees J, Mackey J, Martinko M, et al. The mediating role of perceptions of abusive supervision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ersonality and aggression. *Journal of Leadership & Organizational Studies*, 2014, 21(4): 403-413
 - 24 Maxwell JP. Psychometric properties of a Chinese version of the buss-warren aggression questionnaire. *Personality & Individual Differences*, 2008, 44(4): 943-953
 - 25 谢倩, 陈谢平, 张进辅, 等. 大学生犬儒态度与生活满意度的关系: 社会支持的调节作用. *心理发展与教育*, 2011, 27: 181-187
 - 26 Anderson JC, Gerbing DW.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in practice. A review and recommended two-step approach.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988, 103: 411-423
 - 27 吴艳, 温忠麟. 结构方程建模中的题目打包策略. *心理科学进展*, 2011, 19(12): 1859-1867
 - 28 周浩, 龙立荣. 共同方法偏差的统计检验与控制方法. *心理科学进展*, 2004, 12(6): 942-950
 - 29 柳士顺, 凌文轻. 多重中介模型及其应用. *心理科学*, 2009, 32(2): 433-435
 - 30 林文莺, 侯杰泰. 结构方程分析——模式之等同及修正. *教育学报(香港)*, 1995, 23(1): 147-162
 - 31 Shrout PE, Bolger N. Mediation in experimental and nonexperimental studies: New procedures and recommendations. *Psychological Methods*, 2002, 7(3): 422-445
 - 32 刘亚. 神经质与生活满意度的关系: 情绪和自尊的链式中介作用. *心理科学*, 2012, 5: 1254-1260
 - 33 蒋奖, 许燕. 儿童期虐待、父母教养方式与反社会人格的关系.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2008, 16(6): 642-645

(收稿日期:2016-11-02)

(上接第683页)

- 29 Bode C, de Ridder DT, Kuijer RG, et al. Effects of an intervention promoting proactive coping competencies in middle and late adulthood. *The Gerontologist*, 2007, 47(1): 42-51
- 30 Cole DA, Maxwell SE. Testing mediational models with longitudinal data: questions and tips in the use of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Journal of Abnormal Psychology*, 2003, 112(4): 558-577
- 31 Kraemer HC, Kiernan M, Essex M, et al. How and why criteria defining moderators and mediators differ between the Baron & Kenny and MacArthur approaches. *Health Psychology*, 2008, 2: S101-S108
- 32 Mitchell MA, Maxwell SE. A Comparison of the Cross-Sectional and Sequential Designs when Assessing Longitudinal Mediation. *Multivariate Behavioral Research*, 2013, 48(3): 301-339
- 33 齐亚静, 伍新春, 王晓丽. 中小学教师工作重塑与工作投入的交叉滞后分析.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2016, 24(5): 935-938

(收稿日期:2016-11-10)